

七桥,最初见于曾巩的诗《离齐州后诗》:“从此七桥风与月,梦魂常到木兰舟”,曾巩在熙宁五年(即1072年)任齐州(即济南)知府,两年后离任,离任时,济南百姓不愿意他走,将城门关闭,然而,他趁着夜色悄然离开。这是他离开济南之后写下的诗句,感怀他在济南的时光。

“七桥”分别是芙蓉、水西、湖西、北池,其余三个桥的名字由于年代久远,已经湮灭。明末刘敕写的《齐乘》载:“环湖有七桥,曰芙蓉、曰水西、曰湖西、曰北池,其三失名。”后来有人认为是:百花桥、鹊华桥和泺源桥,但争议颇多,没有定论。一千多年的时间历经兵燹、战乱以及天灾、火患,“七桥”踪迹实难寻觅,不仅难以定论,而且我想其规模也是有限的。

可以想见,曾巩时期的大明湖四周,水域宽阔,住户稀疏,随着时代的更迭变迁,湖的面积被不断地蚕食而变窄变小。解放初期,大明湖的面积已经小得可怜,那时候,肯定也没有城管部门,似乎也谈不上什么“违建”一说,于是,慢慢地一些街道便滋生出来了,湖畔周围的南北历山街、玉斌府街、阁子前街、阁子后街、高祥后街……前后左右足足有几十条街星罗棋布,将“七桥风月”淹没。

解放前,大明湖被当地的渔民分割成了私家之地,连游船也难以成行,老舍在他写的《大明湖之春》说:“一听到‘大明湖’这三个字,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,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。事实上,它既不大,又不明,也不‘湖’。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,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‘地’。‘地’外留着几条沟,游艇沿沟而行,……东一块莲,西一块蒲,土坝挡住了水,蒲苇又遮住了莲,一望无景,只见高高低低的‘庄稼’。艇行沟内,如穿行高粱地,热气腾腾,碰巧了还臭气烘烘。夏天总算还好,假若水不太臭,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,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。春天,则下有黑汤,旁有破烂的土坝;风又那么野,绿柳新蒲东倒西歪。所以,它既不大,又不明,也不‘湖’。湖之不大与不明,都因为湖已不‘湖’。假若能把‘地’都收回,拆开土坝,挖深了湖身,它当然可以马上既有大且明起来的:湖面原本不小,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。这个,也许一时做不到。”

但难以泯灭的是诗人的情怀,他们在诗里寻找“七桥”的存在,寻找大明湖之“明”,清代诗人翁方纲哀叹道:“古来北渚作

【厂子记忆】

□韩庆祥

“我的工厂坐落在小清河边上/奇伟的华山是它美丽的屏障……”

这首诗写于1964年7月,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首诗,“发表”在厂门口的黑板报上。50多年过去了,这首诗不曾忘记,我的工厂更是时常在深夜进入梦境。

那时中专毕业包分配。我们27名毕业生,被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连人带行李送进工厂。这是省机械厅刚刚筹建的山东省机床维修站,别看门口还没挂厂牌,可是家省级企业呢!工资标准和济南一机床二机床相同,第一年实习,工资31.5元。

这里原是一家下马的化工厂,进车间走几步,脚印里就渗出黄色液体,不几天就烧坏了鞋底,真领教了盐酸的厉害。空旷的厂区内,有两座破旧的车间,紧靠大堤是几间厨房、饭厅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,穿过一片青青的芦苇荡,一直通往两排简陋的平房,那就是同学们的宿舍。

我们浑身技术用不上,每天干的是力气活,搬砖和灰,拉土铺路,补齐厂房的窗扇,盖起简易厕所;新设备来了,还要抡起大锤打地槽,安装打平。我兼任厂部广播员,每天晨曦初露,厂区的大喇叭一响,浑身有股创业者的豪情。

厂区东边没有墙,以水沟为界。接连几天大雨,整个厂区白花花一片汪洋。我们在雨中扛着沙袋,趟着泥水,铲土筑坝。入夜,雨终于停了,大水挡住了。

从小哪干过这活儿?睡得好死。睡梦中,听到有人喊:“进水了!”一骨碌翻身下床,刚伸脚找鞋,水没到小腿。事后,才知道了小清河的“脾气”:下雨时,别看河水不深,雨停了就上涨。因为济南地势南高北低,大雨过后,遍地的雨水直奔小清河。由于河床淤塞,河道狭窄,小清河泄洪不畅,积水成渊,每逢大雨就泛滥成灾。

太阳升起来了,照着这一片泽国。我爬到一块木板上,用木棍子当撑篙,一气



▲ 大明湖鹊华桥



明府城史话  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## 七桥、曾堤及东湖

□武存中

湖心,今日七桥皆画稿。”他说只有到画家的画稿之中去寻找“七桥”了。

除了画稿,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寄托诗人的情怀,那就是梦。

有趣的是,乾隆帝来济南时,曾经写下了《题鹊华桥》的诗三首,在第一首中他写道:“望见鹊华山色好,石桥名亦与凡殊。”第二首诗写道:“大明岂是银河畔,何事居然架鹊桥?”将“鹊华桥”与天上的牛郎织女来相会的“鹊桥”当成了一条河,这种联想十分有趣。

我曾经想,“七桥”在诗人梦里,是有七种不同造型的桥梁,比如是五孔、三孔拱桥,或者是方形拱桥,或者是半圆形、圆月形,等等。总之如彩虹飞架,如弯月落波,它们绝不仅在诗人的梦里,也经常在我们百姓的梦里。甚至不仅是七桥,而是十四桥,二十一桥,二十八桥,等等,无穷无尽,层出不穷,不断叠加。

出现在我们梦里的还有一条湖堤,叫

## 水里火里我跟着你

摆渡到广播室。屋里屋外也是一尺多深的水,好在广播设备没受损失,不一会儿,厂区上空响起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激扬的歌声,驱散了心头的阴霾。厨房停摆了,机械厅派车往厂里送饭。

第三天,水退了。锻工班小伙子天刚亮就点火开工,大烟囱上一股股浓烟迎来旭日,红炉闪耀着通红的火焰。“哐哐哐”,空气锤用它粗犷而急促的大嗓门,结结实实地锻造着企业的未来。

1965年,我厂又在小清河南岸用一家下马的铸造厂建起新厂。这样,南北两厂,隔河相对。北厂制造齿轮(几年后独立为济南齿轮厂),南厂主攻机床大修。

在三年困难时期后复苏的各行各业,急需的工作母机供不应求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托关系也买不到一台机床。机械部组建了八个机床修理总站,要求各地抓紧修复旧机床,我们厂就是八个总站之一,连周边省份都送来机床大修。旧机床进厂时锈迹斑斑,缺胳膊少腿,出厂时锃光瓦亮,精度达到了新机床标准。

机床零件拆卸后满是油污,工人一直用汽油做清洗剂。正是这个要命的疏忽大意,被一盆汽油,烧毁了我厂当时仅有的一座5000多平方米、三跨带行车的大车间。那是1966年的7月,一个新学员,给师傅们点烟,顺手把半截火柴往后一丢,正好丢到汽油盆里。刹那间,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,点燃了屋顶的苇箔。我们立即拨打消防电话,等消防车赶到,车间已经烧到一半。其实消防队离我们厂并不远,但我厂的注册地址在小清河北岸。消防车开到北岸,猛然看到火场在南岸,赶紧返回,可见那个年代何等无序。

风助火势,火头噼里啪啦向西蔓延。工人们冒着危险,抢出贵重的仪表和资料,头顶上不断掉落的瓦片和带火的檩条,砸伤了好几个人。有的简单包扎一下,



▲ 大明湖鹊华桥

“曾堤”。我们知道,杭州西湖有一个“苏堤”是苏东坡任职杭州时,为西湖疏浚而将湖泥堆砌成了一条堤,G20杭州峰会时,会标上面的断桥便是架在苏堤上的。在济南同样也有一条因为疏浚而堆砌的堤——曾堤。大明湖南岸的阁子前街,阁子后街和北门里街到历山街,这就是当年的“曾堤”。今天的曾堤从大明湖新景区百花桥向北,一直延伸到明湖北岸的汇波桥下。

我记得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,我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人,他向我问道:“请问先生,你知不知道小明湖在什么地方?”我说:“济南只有一个大明湖,哪里来的小明湖?你是不是在找百花洲啊?”他说:“不是,以前济南就是有一个小明湖。也叫东湖。不是百花洲。”我无言以对,只好说:“对不起,我真不知道有一个小明湖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在济南的东顺城街西面,南北历山街的东面,被包围在断墙残壁之下,有一处水洼,一池臭水,蚊蝇滋生,简直不堪入目,原来这里就是过去赫赫有名的小明湖!正因为有了它,大明湖才称为“西湖”。

“七桥”的淹没,曾堤的变化,东湖的湮灭,全都化入人们的梦境,只剩下一声“当时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”的哀叹。是不是像在泰山路上的那一处“風月无边”刻石,只剩下了“虫字上面加一撇”和“二”字,变得无影无踪?

然而,新事浩茫连广宇,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雷声在路上,你只看到了闪电。

当所有的梦境变为现实的时候,我惊诧于它们的壮美了。

## 水里火里我跟着你

又冲进火海。人在危机与灾难面前,会爆发出英雄般的奇迹,车工班的年轻人一声大喊,硬把一台几百公斤的精密设备抬出车间。火灾过后,他们几个人试了试,却再也抬不动了。车间只剩断壁残垣,抬头是满天乌云,心爱的设备被砸在废墟里,不少老师傅嚎啕大哭。灾后的车间,加高、加固,更换了混凝土预制屋顶,半年后恢复生产。随后,又建成几座新车间。

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厂子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。党的好政策,让不少知识分子甩掉了包袱,焕发了创造力。有的为企业攻坚克难,解决技术难题,有的善于运筹帷幄,扩大产品销路。由于我厂技术精良,产品畅销大江南北,成为机床配件行业的理事长单位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新生的房地产业急需的电梯,都被洋品牌占领了。我们厂瞄准了刚刚起步的民用电梯行业,在1986年,就研制开发出电梯曳引机(楼房顶层的电梯牵引设备)投放市场,顺势成立了济南曳引机厂,发行股票,职工持股参股分红,企业利润大增。有位厂领导感叹:“要想富,就跟上建设部!”那一任上中层领导,真是颇具眼力。

由于我在管理岗位上有些创新成果,被调进了机关,心里却时刻关注我厂的命运。后来,在国企改革的大浪中,我的工厂被拍到沙滩上,厂子停产,近百亩土地的厂区,面临拆除。

正是秋雨过后,华不注在雨雾中露出峰顶。宽阔美丽的小清河,在微风中拂起层层涟漪。一条通往华山的大路,要穿厂而过。工厂的大门、围墙、礼堂,已经拆得遍地瓦砾。当年火热的车间,窗框、门框荡然无存。路两边的梧桐树,见证了厂子从繁荣到废弃的沉痛过程。厂外不远处,轧路机那沉重的轧辊,就要开过来了。我心中的工厂——水里火里我跟着你……

【泉城往事】

## 济南最后的私塾

□孙葆元

济南的私塾消失在哪一天并不重要,有历史意义的是它消失前的最后岁月。旧教育意识的坚守与新教育体系的渐进,这样的交替持续了将近三十年。现在年近八旬的老人有些有私塾底子,向前推八十年,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。起码在1934年之前私塾这种教育形式还在济南周边的农村延续着。然而私塾制度在1901年就被清政府废止了。1893年,张之洞给光绪帝上了一道设立学堂教育的奏折,这个奏折兼顾了私塾与学堂两种教育形式的存在,此后两种教育模式的争论不绝于朝廷,1901年光绪帝下诏,自明年始,乡试、会试等均试策论,不准用八股文程式,并且停止了武科的乡试、会试,以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,这是私塾制度的终结。

制度终结了,它的形式还在民间延续着,当时济南周边乡里学校与私塾并存,学校还不普及,只有大一些的乡镇才设学校,而私塾遍地开花。一位家在历城与章丘搭界的老人告诉我,他们村请先生来设馆,弟子投馆每人每年须交二十五斤粮食,开馆之初常常见小小的弟子们背着粮食袋去上学,那是给先生的脩束,即现在的学费。

不管学堂还是私塾都需要家庭有一定的财力支持,很多欲培养孩子读书的家庭选私塾而弃学堂,他们认为学堂里学的那些“大羊和小羊,一起上山岗,山上草青青……”的课文没有用,远不如私塾里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更有教化意义,所以私塾绵延。这里是孔孟之乡,从孔子设杏坛,到这些先生最后的绝唱,私塾始于齐鲁大地,终于齐鲁大地。现在八十岁左右的老人是那个学制最后的弟子。

入私塾第一课,先生从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教起,然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渐进,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教遍。弟子入学,学习方法就是背书,死记硬背,背过一部书,由先生检查,认为背熟了,再指定下一部书。到了一定程度才开讲。开讲叫开蒙。书中的道理先生才逐一告诉弟子。现在回过头去考察这种教育形式,优劣并存,并不是消亡的东西就一无是处,它的独到之处是,在孩提时代就确立了读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千年以来,读书人一直是社会的脊梁。私塾的课业统一,课本却形形色色,有私家刻印的,有集市上买来的,更有穷学生买不起,就借了同学的书抄,往往抄书的学生比照书死背的学生记得更快。私塾念完,学生便走入考取功名的博弈,考试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,先由县试、府试、院试取得生员资格。这个形式有点像今天的自学考试。获得生员资格才有机会参加乡试,乡试在省城贡院举行,中举者称解元,获得这个身份才可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,这是中央级的考试,获得会试第一名自然叫会元,与其他贡士参加皇帝的殿试,才能分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,只有搞明白这个考试进程才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

光绪帝一纸诏书废除了这个制度,学子们进身的阶梯没有了,上世纪三十年代私塾的意义只剩下识字和明理。乡野荒村,乡民们不知外边世界的变迁,仍然固守着这种传统的教育习惯,是一种时代的落伍,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?遗产文化有时是功利的,当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被乡民们认可,私塾就真的终结了。